

小述镇屏山平等寺与潮音洞

文/黄胜国



镇屏山全貌景观,平等寺位于山顶,潮音洞位于北侧山脚左下方

在镇江西津渡西津音乐厅东南侧,迎江路东有一座小山,叫镇屏山,海拔仅22米。山体大致呈南北走向,南北长80米左右,东西狭长50米左右。呈阶梯状地形,顶部平缓,大致山体南面倾斜低缓,北坡陡峭直立。镇屏山名的由来民间有正平山、正屏山、蒸饼山等几种不同的叫法。早在元代《至顺镇江志》中,就有比较翔实的记述,“正平山在京口城西一里”。《至顺镇江志》中又载:“按京口三面依山,阙其一以临大江。是山峙于江岸,无嵒岿之势,凭高而望,不倾不倚,式正且平。若巨灵恶洪涛之汹涌。遗此镇压。则名固实之宾也。”解说了正平山名字由来可查考的最早渊源。后来演变成镇屏山,也是山名山势形态内涵的含义。有镇守云台山东侧,抵挡长江东来海潮推进,作为先锋屏障之意。

镇屏山在唐宋元时期,与云台山下的西津渡、蒜山一样,都是镇江西北部长江南北水运港口登岸的码头之一,其中元代曾有水军在此操练驻扎。

平等寺 元《至顺镇江志》记载,镇屏山上在宋代曾建有平等寺。唐宋时期佛教在镇江传播兴盛,连接长江及京杭大运河南北航运的西津古渡区域,佛道宗教文化发达。该区域内的银山、玉山、蒜山都有众多寺庙分布。南宋绍兴年间僧人祖华在小庵的地基上扩修建寺,因为得到一块内容为“平等”的石刻门额,故取名平等寺。元至大四年(1311年)建成江口坊平等寺,其规模在《至顺镇江志》中有记载:“栋宇翬飞,金碧绚烂,来者目动神骇,若御风乘云游仙之宫。”宋元时期,平等寺相邻不远处的云台山有云山寺、聚明山寺,玉山报恩寺(元至大三年建),西津渡则建有天

妃庙、龙王庙、关王庙、褒忠庙等。

登临镇屏山顶平等寺,抬眼北望,可见一江横呈,东西蜿蜒如练。身后古城镇江三面环山,山林景象,苍翠葱茏。西边不远处就是金山、蒜山、玉山横列,西南侧有云台山依靠,东面可以眺望北固山、象山、焦山。确有“目动神骇,若御风乘云游仙”之慨。

现今镇屏山平等寺已经不存,清《丹徒县志》中光绪五年(1879年)的镇江古地图上有镇屏山地名。并在山顶北侧标注有寺庙一座,推测在清咸丰年间为太平军焚毁。现今在镇屏山北侧陡崖山体中,还可以发现一段十多米长,乱砖垒砌的太平军构筑的太平天国新城城墙遗址。

潮音洞 清《乾隆镇江府志》卷二记载:“镇屏山在银山侧,下有潮音洞。”具体位置在镇屏山北侧山崖下,此处石灰岩面岩体北临江,经过千万年江水浸润冲刷侵蚀,形成天然石灰岩洞穴,潮起潮落可以闻听江水波浪冲击洞穴的回音。佛教大辞典记载:“音之大者,譬之于海潮。又海潮无念,不违其时,与大悲之音声,应时适机而说法相。”《法华经普门品》有文:“梵音海潮音。”佛教文化中,有海潮喻其雄壮而远闻,潮音有佛音之意,江水涛声不绝如同观音,又如众僧诵经朗朗之音的说法,故名。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在镇江建立领事馆,设租界。镇屏山北侧山下成为英租界范围,在现今西津音乐厅(原航运小学)地址设立怡和洋行,从事五金、路矿器材、木材和日用消费品等进出口贸易。距离怡和洋行数百米远的潮音洞一度成为怡和洋行的物资驳载和堆栈仓库。“文革”前,潮音洞尚有香客朝拜,时有香火缭绕。洞旁曾有一位李姓老者风居住于此看护。

潮音洞古洞穴在1969年后挖掘成防空洞,原来工人文化宫东侧有地下防空洞连接到潮音洞内防空洞,镇屏山防空洞和云台山防空洞、宝盖山防空洞、风车山防空洞互相贯穿连通,构成完整一体的数山连通防空洞体系。前几年建造西津音乐厅时,镇屏山防空洞地下部分被挖断回填。现在潮音洞入口处因为砖砌改造成防空洞,原先古潮音洞入口处天然洞穴外观已不可见。

镇屏山潮音洞与传说中的银山门藏宝洞、西津渡昭关石塔下的观音洞、铁柱宫里的紫阳洞都属于石灰岩溶洞穴,也都曾被历代佛教和道家信众们赋予佛道典故教义,具有较为深厚的人文历史蕴义故事和传说。它和镇屏山平等寺是待开发的人文旅游资源。

闻捷在抗敌演剧四队

文/沈晓昆 吴明宝

抗敌演剧队成立于1938年8月10日。1938年,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担任了在武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所直接领导下的第三厅主管宣传由郭沫若担任厅长。为了抗战宣传的需要,周恩来决定由第三厅收编这些民众救亡剧团,成立十个演剧队、四个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你们是战斗的文艺队伍,十个队不亚于十个师。”

在这十支队伍中,抗敌演剧四队属于中途折损的一支。四队的前身是由上海留日同学会组成的上海救亡演剧第十一队,武汉整编后,他们同样被派往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四队生存的时间只有两年九个月。

闻捷(1923年-1971年),原名赵文节,曾用名巫之禄,现代著名诗人,江苏丹徒人。历任新华通讯社西北总社采访部主任、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兰州分会副主席。闻捷参加革命在参加抗敌演剧四队之前,由于时间久远,记载的文字很少。抗敌初期和闻捷同在抗敌演剧四队的姚北桦,在《暮鼓晨钟》(今日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有文章介绍说:“这时期我们恰和闻捷同志一道工作,因此撰文对闻捷的史实补遗。”

闻捷在演剧四队时,名叫巫咸。抗战爆发时,他在南京水西门外一家煤厂当学徒。1938年初,年仅15岁的他从南京辗转流亡到武汉,住在武昌红楼里的平津流亡同学会中。并和住在该会的华北宣传队同志一道工作。同年8月,郭沫若同志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组建十个抗敌演剧队。经友人介绍,闻捷参加了抗敌演剧四队,成为四队最年轻的成员之一。

1938年9月,闻捷随抗演四队开赴鄂东宋部埠,投入保卫大武汉的宣传作。从武汉撤退后,又随队经长沙市到达湖北宜昌、荆门,在战区生活十分艰苦,行踪漂浮不定,而闻捷每天总是乐呵呵的,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上,他不大演戏剧,普通话也说不太好,常常扮演所谓龙套的角色。但他从不计较这些,有戏就演戏,没有戏就在队里搞杂务,保管服装、布置背景,以至上街刷标语,贴壁报,什么事都抢着干。

闻捷参加四队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当时队内有地下党和民间组织,在同志们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学习《论持久战》《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并阅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有时也悄悄地练习写作。这样,闻捷从一个爱国青年,迅速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战士。1938年底,四队党组织吸收他入党,在荆门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主持仪式的是当时任中共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的曾志同志。

闻捷入党后不久,就因故离开四队去襄樊,在那里参加了武战区政治部政

治总队的第八中队。这个队的成员大部分是鄂北的进步青年,有地下党员近四十人,组成特别支部,在鄂西北区党委(实际负责人是曹荻秋同志)领导下工作。

1939年4月,国民党特务对八中队的地下党组织伸出了罪恶的黑手,逮捕了特支书记、特支委员。5月,入队不久的闻捷等十位同志也相继在草店被捕,先后关押在湖北均县、郧阳等地监狱。闻捷虽入党不久,但在狱中表现沉着机智,和难友们团结斗争,拒不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半年后,敌人找不到任何证据,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1939年冬,不得不将闻捷等分批释放。

出狱后,闻捷在樊城秘密会见的抗演四队地下党负责人。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离开鄂北,经兴山、秭归,翻越鄂西大山,千里跋涉去重庆。不久,他就奔赴延安了。

《姚北桦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中有《高擎抗日烽火的一支演剧队——记抗敌演剧第四队》长文,文中有“关于诗人闻捷”专节。文中又提到了一些细节:

闻捷的曾用名除巫咸外,还有巫拓真一名。闻捷在武汉参加华北宣传队工作时,经张叔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叔友是华北宣传队的唯一党员。据抗演六队队史(油印本1987年2期)载,张叔友烈士1945年8月在蚌埠做敌军工作时,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闻捷被捕后约半年获释出狱,在老河口城外,他秘密会见了演剧队地下党负责人鲁阳,在同志们的资助下,赴重庆找到王世振(又名王刚)以后通过组织关系去延安,在延安成长为一位新闻记者和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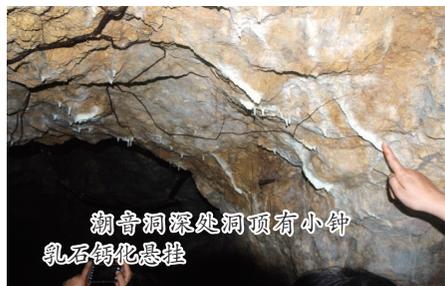
十年浩劫时期,有着光荣斗争历史的抗敌演剧队被污蔑为国民党别动队,分散全国各地的演剧队员惨遭迫害,几乎无一幸免。闻捷除了一项“特务”帽子外,因为坐过牢,又多了一顶“叛徒”的帽子,在这两项大帽子的沉重压力下,他忍受不了非人的侮辱,终于在1971年的一个夜晚,在上海寓所打开了煤气,以死表示了对“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抗议。

姚北桦在文章中指出,这段史实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闻捷参加革命不是1940年到延安之后,而是1938年在抗演四队时开始,二闻捷在狱中经受住考验,没有任何玷污党员称号的行为,这是同时被捕的同志均可证明的。

1978年夏,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抗敌演剧队的性质及其他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抗敌演剧队是党直接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特殊斗争环境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革命文艺队伍,不是什么反动团体,更不是反革命组织。闻捷在抗敌演剧四队的情况也就有了十分明确的结论。



镇屏山山脚北侧潮音洞入口处有人防工程标牌



潮音洞深处洞顶有小洞乳石钙化悬挂